

新诗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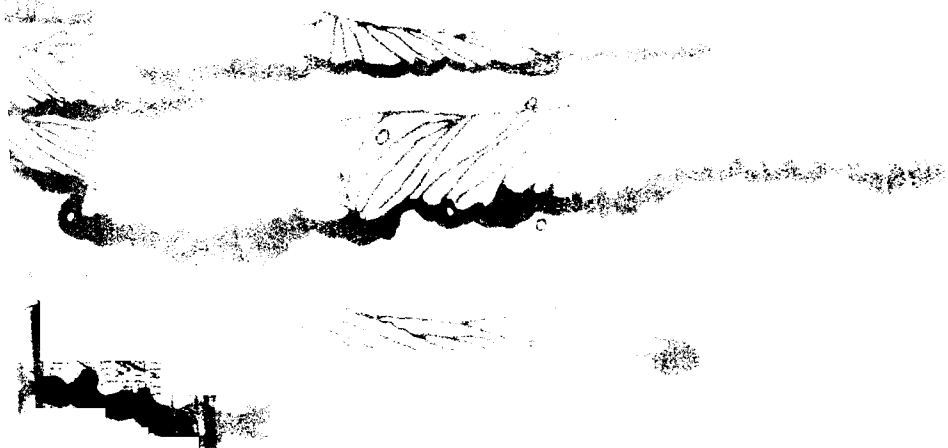
晓
雪

花 城 出 版 社

XINSHIDECHUNTIAN

新诗的春天

晓 雷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袁宝泉 杨光治

装帧设计 马达礼

新 诗 的 春 天

晓 雪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东省政法干部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5印张 1插页 100,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书号 10261·371 定价 0.55元

目 录

新诗的春天·····	I
歌唱时代,反映生活,大胆创造·····	18
中国新诗的繁荣与精神文明的建设·····	27
我国当代的少数民族诗歌·····	35
中国新诗发展的广阔道路·····	49
——从全国第一届新诗(诗集)评奖谈起	
继续研究艾青·····	56
——《生活的牧歌》再版后记	
艾青的诗美学·····	73
诗人的职责和评论家的任务·····	97
——兼评《将军和士兵》	
田间作《云南行》序·····	105
燃烧着火热青春的诗·····	117
——序邵燕祥《为青春作证》	
张长的诗·····	125
——序《凤尾竹的梦》	
丰其麟作《凤凰歌》序·····	132
序诗集《酿蜜的时代》·····	138
关于《桂林山水诗》的通信·····	144
略谈一首诗的修改·····	152
学诗漫笔·····	155

新 诗 的 春 天

——在市办文学期刊诗歌座谈会上的发言

市办文学期刊，绝大多数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乘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东风，如雨后春笋般兴办起来的。我有一个总的印象，感到这批刊物是新生的、朝气蓬勃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其中不少办得很好的刊物，比起某些“老资格”的刊物来，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青春》、《希望》、《芳草》、《西湖》、《滇池》、《花溪》、《长安》、《芒种》、《海燕》……仅仅从这些美妙的富有诗意的刊名，就使人感到充满希望和力量，使人感到我们的文艺、我们的诗歌正进入欣欣向荣的春天……

进入新时期，走向大繁荣

有人说，新诗面临着“危机”。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的新诗正进入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春天，它正在广阔的道路走向更大的发展和繁荣，它面临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更加兴旺发达的，真正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未来。

这绝不是盲目乐观。这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期望，历史的潮流，也是粉碎“四人帮”四年来新诗发展的可喜成果

所充分证明了的，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大家记得，正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严寒的日子里，在我们民族处于最迷茫、最窒息的时刻，被迫沉默了十年的中国诗神，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迎着那无比凄厉的丙辰清明风雨，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这就是举世瞩目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

“四五”诗歌运动是我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表明诗歌掌握在人民手中，可以发挥多么奇异的巨大威力。它所带来的影响深远的震动，其它任何文学艺术样式都无法相比。它将同时作为一个伟大历史新时期的序幕和中国新诗获得光辉新发展的起点，而载入史册。

果然，随着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和中国各族人民的新的觉醒，随着以冲破现代迷信的禁锢为特征的气势磅礴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我国新诗也进一步发扬“五四”和“四五”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进入了真正复兴和发展的新时期。

从《中国的十月》（贺敬之）、《一月的哀思》（李瑛）、《周总理，你在哪里？》（柯岩），到《在浪尖上》（艾青）、《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白桦）、《按照人民的命令》（张志民）、《致窦守芳同志》（邵燕祥）；从《光的赞歌》（艾青）、《星》（公刘）、《呼声》（李发模）、《不满》（骆耕野），到《小草在歌唱》（雷抒雁）、《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熊光炯）、《听，有一个声音》（艾青），到《将军，不能那样做》（叶文福）、《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边国政）、《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熊召政），我们的新诗不仅在一次又一次的盛大诗歌朗诵会上，赢得了暴

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而且在亿万人民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我们的新诗，从“四人帮”控制文坛的“瞒和骗”的绝境、“假、大、空”的流风中奔突出，奏响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大胆地触及时弊，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光荣而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赋予它的崇高使命。它不但最及时、最充分地讴歌了粉碎“四人帮”这一伟大历史性胜利的深远意义，表达出多少年被压抑而今如火山爆发般喷射出来的人民的感情——他们昨天的巨大的痛苦、冤仇、愤怒和今天的激情的欢呼，而且正一步比一步深刻有力、一年比一年震撼灵魂地发出了时代的呼唤，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唱出了人民挣脱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后的深沉的思考、美妙的幻想、热烈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心。

如果说，建国之初，“新诗是和共和国一同进入胜利的拱门的。新诗是带着欢呼声和人民一同前进的。”那么这四年来，从主流和总的倾向上看，我们的新诗仍然是“和共和国一同进入”粉碎“四人帮”这一“胜利的拱门”，“和人民一同前进”在新长征的广阔道路上的。我们的新诗在努力“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同回答。”在新时期的灿烂阳光下，面对着冰化雪消、万物复苏的大地，又回顾着恶梦般的十年浩劫和历史走过的曲折漫长的道路，我们的人民获得了新的觉醒，思想更深刻、更成熟了。我们的诗人和新诗，也同人民一起走向成熟。这种思想上的成熟和艺术上的突破，不但表现在艾青这样饱经忧患而又继续保持着艺术青春的老诗人的创作中，表现在公刘、白桦、李瑛、柯岩、邵燕祥、流沙河、周良沛等这样一大批在思想上、生活上和艺术上都有了较多的准备和积累的中年诗人的新作中，

而且也表现在许多青年诗人的作品中，这是特别令人高兴的。

西方的厂区烟囱入云，
为什么中国古老的石磨
还在艰难痛苦地呻吟？

——毛志成：《啊，长江黄河的子孙》

由于默契，由于爱情，我来啦！
我来耕耘，把觉醒的种子播撒，
我来啦，带着布鲁诺殉难的光焰，
我来啦，带着现代僧侣鞭挞的伤疤。

.....

我带来了无声的变革的风暴，
我带来了新的不安，新的喜悦，新的奋发，
我来淘汰，我来筛选，我来建设，
用新的尺度把现存的一切鉴定审查。

——张学梦：《科学说：我来啦！》

今天，耕作机在地里飞奔，
效率，竟是锄头的一千倍！
我看见技术员热腾腾的脸上，
也闪着同样晶莹莹的汗水！
汗水啊，你紧随一切运动着的生命，
汗水啊，你的价值却有贱有贵。
当勤劳和智慧融在一起，

你便是又圓又亮的珍珠；
當勤勞和愚昧融在一起，
你只能是又苦又濕的眼淚！

——傅天琳：《汗水》

成批的诗坛新秀和他们的诗作表明，被愚弄、受欺骗的一代，已成为觉醒的一代、思考的一代；他们决心做新时代的主人，“新生活的歌者”；他们立志“要更深地了解社会，了解时代”，用自己的诗“体现出生活中的美，人们心灵中的美”；他们努力“在生活中寻找和表现美好的东西，并激昂地鞭挞丑恶”；他们要唱那种“象海那样激荡，又象海那样深沉”的歌，使自己的歌“和我们的时代一同前进，而不是被时代抛弃”；他们“宣告青春的纪元”，宣告自己是“新时刻表的开端”，而以自己独特的“崭新的个性、崭新的风格，走向晨曦，走向世界。”他们以磅礴的气势和火热的激情，以独特的构思和勇敢的声音，激荡人心地喊出了当代我国人民内心的企望和要求，喊出了人民对贫穷落后的不满，对封建主义的痛恨，对因循守旧的厌弃，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和对四化远景的向往、对伟大变革的呼吁。从他们的诗中，我们看到了对新的艺术美的追求，感到了人民的脉搏的跳动，也听到了我们伟大时代的音响。骆耕野的《不满》，不就是因为这一点而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么？“我不满步枪；不满水车；不满帆船；不满泥泞；不满官僚主义，不满软弱的法制；我抗议马拉松会议，以时间的名义；我控诉宗教式的软禁，以真理的呼喊……”“谁说不满就是异端？谁说不满就是背叛？谁说不满就是不爱？谁说不满就

是抱怨？谁说不满是背弃出类拔萃的先人？谁说不满是衰德高望重的圣贤？——不满正是对变革的希冀，不满乃是那创造的发端。”

这里，我不打算对我们四年来的新诗创作做全面的分析和评价，而只是想通过简单的极不全面的回顾，说明我们的新诗已经生机勃勃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职责。从揭批“四人帮”到歌颂老一代，从追念张志新烈士到歌颂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从对黑暗的控诉，对胜利的欢呼，到对现实和历史的深沉的思索，对理想和未来的急切的追求，新诗都是比较及时地表达出了人民的情绪、人民的要求和人民的心声的。而且不论内容和形式，不论思想或艺术，我们的新诗都开始突破种种桎梏，走向广阔的天地。被迫沉默十年、二十年的一大批老诗人和中年诗人，如今以更成熟的姿态、更饱满的激情，深沉有力地歌唱着。成批的青年诗人如群星般闪现，为我们的诗坛带来了新的声音、新的光彩。新的题材领域的开拓，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新的思想上的突破，都表明我们的新诗不但没有面临“危机”，而是在广阔的道路上前进着，发展着，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我们对新诗今天的成就，应当感到欢欣鼓舞，感到由衷的喜悦，对它的明天的发展，更应寄予无限的希望，充满坚定的信心。我们的刊物，我们的编辑，我们的评论家们，当前首先应当理直气壮地为新诗说话，为新诗叫好，为新诗欢呼！那些认为“新诗没有读者”、“新诗面临危机”之类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艾青在《和诗歌爱好者谈诗》中说得好：

“有人说诗歌赶不上小说、戏剧、电影受欢迎。

“我以为何必要那样比呢。各种文艺样式，各有各的性

能和作用。

“不要顾忌那些随心所欲的议论；不要想从抱有成见的人嘴中去听到真理。对新诗用不着悲观。”

雄厚的基础， 广阔的道路

从胡适的《尝试集》开始，新诗已产生、存在和发展了六十余年。六十多年来，新诗的园地里，开放过各种各样的花朵，出现过各种不同的流派，产生过不少优秀的、有影响的、独树一帜的诗人，和许多为人民所喜爱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诗。尽管有人不喜欢看新诗，有人笼统地反对一切新诗，说“新诗不是诗”，但新诗始终存在着，而且发展着，而且越来越广泛地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越来越深入地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和心灵里“作窝”。它已经形成自己优秀的传统和深厚的基础。

象白话文一定要代替文言文一样，新诗的出现和发展是不可抗拒的。新诗，作为一种更自由、更充分地表达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的诗歌形式，作为反映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表现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伟大时代的人民情绪的诗歌形式，它本身就是对旧诗的背叛和革命。它不是五四时期某几个诗人心血来潮随便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适应革命的需要，人民的要求和时代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的。它是新时代的产物。

从形式上说，它是从外国移植的。但它毕竟从一开始就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在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它是在中国的阳光雨露的哺育下，在中华民族几

千年古老文化的浇灌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所以它一出世就是中国的“胎儿”、中国的新诗，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东西。当然，它是新生的“胎儿”，是迎着新时代的风雨出世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新生儿”。六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当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土壤之中，而又注意从中外一切优秀的诗歌遗产中吸取有益的养料时，它就能茁壮地成长，较好地发展，否则，这种成长和发展就要受到限制。

今天，我们的新诗要向前发展，就应当以六十年间无数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经验教训为基础。我们不是从零开始，不是在一张白纸上重新开始写第一句新诗，而是从这六十年的基础出发的。我们不能丢开这个基础，不能丢开新诗本身在六十年间打下的这个雄厚的基础，而去另起炉灶，另外找什么别的基础。“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说法，摒弃了新诗自己产生和发展的成就、经验及其所打下的基础，又忽略了向外国诗歌学习、从中吸取一切有用的营养这一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理论上是不全面、不完善甚至不妥当的，多年实践的结果也表明它没有给新诗带来新的发展和繁荣。因此，我同意这样的意见：要说基础的话，新诗应该在六十年创作实践和已有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这个基础包含了对古典诗歌的继承、民歌营养的吸取和外国诗歌形式的引进。今后我们还要坚持不断地从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诗歌创作中吸收养料，化为自己的东西，为我所用，以丰富、充实和提高新诗，不断地促进新诗的发展和繁荣。

从这个牢固雄厚的基础出发，我们的新诗面前展开了一条极其广阔的道路。

粉碎“四人帮”四年来的新诗创作，已经充分表明：挣脱了长期的禁锢和种种枷锁，我们的新诗正奔向“思想和幻想、内容和形式的广阔天地”，奔向“个人爱好和个人创造性的广阔天地”。我们不但有了各种感情真挚、思想深刻、动人心魄的政治抒情诗，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十七年中也很少见的爱情诗、讽刺诗、咏物诗和山水诗，以及诗剧、叙事小诗、寓言诗、童话诗等等各种体裁、各种形式风格的诗。我们的新诗，从主题、题材、体裁和形式、风格都越来越多样化，路子显然是越来越宽了。

艾青说过：“中国新诗，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与发展而变动与发展着，而且也将随着中国社会变动与发展下去。”

（见《诗论》：《诗与时代》）这就是说，今后新诗的路子应当更宽些，新诗的艺术和思想的天地应当更广阔些。天上地下，历史现实，新诗是无高不攀、无深不达、“无孔不入”的，是无论什么题材内容都可以表现的。而为了表现各种不同的内容，就必须不断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形式。那种企图按照古典诗歌的规律，为新诗创造一种或一套固定不变的形式种种设想，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艾青所说：

“形式服从内容的需要。

“所有的形式都是根据为了表现不同的生活而产生的。

“是人创造形式，不是形式创造人。为什么要让别人所创造的形式来束缚自己呢？不要让这样那样的形式来奴役我们。”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批判和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种种流毒，继续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大胆创造，让新诗在内

容和形式的广阔天地里，在一条无比广阔的道路 上 向 前 发 展。

“希望写好诗——让人看得懂”

四年来的新诗，在取得很大成绩、走向新的发展的同时，也确实存在、产生和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假大空的流风的影响，不能说已经扫除干净。比起中短篇小说等文学创作的飞跃发展来，新诗确有许多不景气的地方，也还远不能说已经发挥了无愧于时代职责的作用。许多诗集卖不出去，某些诗不受欢迎，某些诗一览无余、索然无味。这些情况确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要不断提高新诗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要大力提倡、鼓励和支持新老诗人们在内容和形式上，在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都不断作新的探索，以便能够写出真正为人民和时代所需要的更多的各式各样的好诗来。

人间要好诗。人民要好诗。时代要好诗。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诗？我们的时代和人民需要什么样的好诗？我们的诗人，要写出什么样的好诗来，才算担负起自己的神圣职责？

我想，不论什么时代，也不论我们的时代如何向前发展，真正的好诗总应当是通过诗人的个性感受，通过多种方式和角度，这样那样地表达出时代的感情和人民的心声的。真正的好诗，总是应当真挚、深切而又独特地表现出人民的情绪、愿望、理想和追求，总是应当表现出人民的愤怒、欢乐、

悲哀以及他们的精神的痛苦，心灵的痛苦总是应当通过独特的创造，把人们引入优美和谐的艺术境界中去。不能给人们以任何美感享受的所谓诗，不能给人们以美好的情操滋润人们的心灵、不能使人民的精神境界变得更美好些的所谓诗，也不能算好诗。

雪莱说：“诗揭开帷幕，露出世界所隐藏的美。”（《诗辨》）我认为这个“揭开”和“露出”的意思很重要。好诗应当是把世界的美、现实的美、生活的美、人民内心的美，独特而新颖地发掘出来（“揭开”）、表现出来（“露出”），它应当追求生活美和艺术美的结合，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而创造出一种真正使人沉醉着迷的艺术境界。它当然必须是能够“出奇制胜”、使人耳目一新的，而不是那种尽人皆知的、一览无余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使人不堪卒读的东西。但既然是“揭开”和“露出”，那就无论怎么独特新颖、如何奇巧不凡，都应当是看得清楚、体会得出或感觉得到的，应当是能够使读者（至少是一部分读者）看懂或“思而得之”的。如果读者根本看不懂，诗人们和许多诗歌爱好者看了也莫名其妙，那这样的诗，我认为就不能说有什么美，不能算好诗，你怎么来判断它美不美，好不好呢？！

这就牵涉到当前这场关于诗歌“懂与不懂”问题的争论了。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会上也争论得十分激烈。有的同志认为，这场争论是无的放矢，毫无意义，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出现谁也看不懂的诗。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看不懂的诗是存在的，讨论一下，争鸣一番，是大有必要的。

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当前诗坛上初露锋芒的许多

青年诗人的某些诗作的看法上。年轻一代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当中已经出现不少有才华的大有希望的诗人。有的青年诗人一出现就以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自己的声音色彩，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都是应当充分肯定的。问题在于：对他们在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之处，对他们为了打破形式风格上的旧框框而走向另一极端，去追求某种模糊不清、飘忽不定、晦涩难懂甚至根本无法理解的“意境”时，是否也要一律给予高度的赞扬？我同意老诗人公刘同志在《新的课题》一文中对顾城的诗所抱的满腔热情的态度。但有的评论家对顾城、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的创作，不加区别地一律赞扬，甚至说他们的某些诗（不是全部）所表现出来的隐晦艰涩的诗风正是中国新诗的未来，等等，我是不大同意的。正确的文艺批评，应当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应当是及时充分地肯定诗人们在新探索中的每一点成绩，也有分析地指出其中的不足和问题。对老诗人如此，对青年诗人也如此。

《诗刊》今年第十期，集中发表了参加北京“创作学习会”的十七位青年诗作者的新作。每一组新作前面都有一段作者表明自己关于诗的主张的话。他们都发表了对诗歌创作的见解。十七位作者的诗也各有特色，使人有一新耳目之感。但顾城的小诗六首中，仍有很难懂、很费解的。例如第一首《在夕光中》全诗如下：

在夕光里，
你把嘴紧紧抿起，
“只有一刻钟了”

就是说，现在上演悲剧。

“要相隔十年、百年！”

“要相距千里、万里！”

忽然你顽皮地一笑，

暴露了真实的年纪。

“话忘了一句。”

“嗯，肯定忘了一句。”

我们始终没有想出，

太阳却已悄悄安息。

顾城在他的“诗前引言”中说：“我爱美，酷爱一种纯净的美、新生的美。”“我渴望进入这样一种美的艺术境界，把那里的一切，笨拙地摹画下来，献给人民，献给人类。”“我寻找美并表现美。”这些主张都是很好的，但他这样的诗却使人看不出这种“纯净的美，新生的美”，看不出他所渴求的是什么样一种“美的艺术境界”。这一首和下面的一首《远和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我反复看了几遍，也请教了好几位诗人和诗歌爱好者，都猜不出作者在写什么，想表达什么意思和情绪。既然看不懂，又怎么知道它美在哪里呢？

这样的诗，作为一种探索，当然也可以试试，顾城同志今后也可以继续写，它也算一格，也可以存在下去，我们完全用不着也不应当绝对排斥或简单地予以指责。但我认为它